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6 中国最佳

九木文

主编●王蒙 选编●王乾荣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2000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九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数位文坛宿将鼎力协助，众权威选家精心编选，倾力打造辽人版2006年度最佳选本。◎今年的选本仍然秉承我们一贯的纯文学主张，将读者最喜欢阅读的文学门类中的精品编选成如下六卷：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中国最佳散文；中国最佳诗歌；中国最佳随笔；中国最佳诗歌。◎主编本丛书的编委及各分卷的选编者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06年1—12月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每卷卷首的序言则无论是作为一份颇有研究价值的、对当年文学的回望与综述，还是作为一份呈送给读者的阅读导引，都是为2006年度的中国文学以及它的众多爱好者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2006] 中国最佳

九木文

主编 ● 王 蒙
选编 ● 王乾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王乾荣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中国最佳杂文/王乾荣选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 1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王蒙主编)

ISBN 978 - 7 - 205 - 06134 - 0

I. 2… II. 王…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7260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 - 23284324 (邮 购) 024 - 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 - 23284191 (发行部) 024 - 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中心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 张: $28\frac{1}{2}$

插 页: 1

字 数: 397 千字

印 数: 1 ~ 7,000

出版时间: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曹小冬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郭大方 吴 迪

定 价: 37.00 元

2006

中国最佳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中国最佳杂文

中国最佳散文

中国最佳随笔

中国最佳诗歌

●辽宁人民出版社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为当代文学存档，已历时九年

●这套丛书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耙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时至今日，它已走过了九个年头，赫然排列出五十多本留存着文学流年芳香的佳作选。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稳稳地占据着文学年选的地位。

●这套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以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编 委 张中行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散文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笔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文卷 王乾荣

诗歌卷 宗仁发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九周年版

- 2006 中国最佳散文
- 2006 中国最佳随笔
- 2006 中国最佳诗歌
- 2006 中国最佳杂文
- 2006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 2006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本丛书编委会从五大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研究与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自1998年至现在九年最佳选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 王乾荣

序 有时三点两点雨 到处十枝五枝花

本人看书，无论经典，还是消遣读物，很少一口气从头看到尾，总是有目录的根据目录，没目录的随手翻翻，觉得哪儿有意思先读哪儿，对选本尤其如此。很多书这样翻过就扔一边了，爱不释手的才读全书。我打听了一下，不少人有这种不良习性。出于这个原因，我把今年的“序”写成对选入本书的各篇大作的的一个“提要”或“简介”，也是选者一孔之见；有的标题，我也略作改动。杂文笔法，一般都是小中见大，弦外有音，须细读方解其妙。我的点滴见解算不上导读，可能很不准确，与别的读者眼光大相径庭，谨供看官参阅，或许对您选读文章有所帮助，我就很高兴了。

有人不爱看“序言”，可以翻过去。我对每篇文章所说寥寥数语，不会喧宾夺主。

阿 敏《开一家毒物大全店》 大毒叫人死，小毒有时却可利病、驱虫、防腐、提味。金钱拜物教时代，人心之毒，且将小毒变大毒——此皆源于“毒”之氛围。与敌人明打，打不过，知道死得其所；被非敌人暗算，死了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安立志《小品先驱刘姥姥》 我很不喜欢拿了人家大段大段文字，来“写”自己的“杂文”——我觉得有剽窃之嫌，但是安立志先生这篇文章例外。他关于《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大观园闹笑话的引述，稍多一些，但是读来不觉厌烦，因他所引详略得当，不失时机稍加议论，饶有趣味。作者由刘姥姥之“演技”、

神态、心智，关照当代小品“大腕”，戏谑中不乏尖酸——今之“大腕”能接受吗？别看人家开涮乡下人可博亿万人傻笑，你刺激人家，人家没准让你吃官司。

毕淑敏《旅游预习》 中国人的旅游时代到来了。但是，很多人不懂也不会旅游。旅游，实则是游风情，游健康，游快乐，游文化，游心得……而不单是“游时髦”，乃至“游金钱”，“游劳累”。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说，山水有地上、画上、梦中和胸中之分。毕淑敏女士在这篇诗化杂文中所说“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它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正是追求“梦中”和“胸中”山水。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才得旅游真谛。游玩山水，亦复有缘；苟机缘未至，虽近在数十里之内，无暇到也。毕淑敏没有“预习”，阳关万里，因为“有缘”，才使她没有失之交臂，并受到心灵的震撼。“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啊。

蔡定剑《“馒头血案”的宪法视角》 宪法学者蔡定剑教授把胡戈的“恶搞”，定位为“一种新的言论表达方式”，而“胡搞”（胡戈之“胡”）又不无在理，当受保护。这就比那些认为“胡搞”或“侵犯了陈凯歌导演著作的完整性”，或“侵犯了作品的修改权和复制权”的法律专家，“视高一角”。

陈仓《改履历，一个“系统工程”》 资格越改越老，年龄越改越小，为什么？陈仓先生说说是为了“抢‘帽子’，捞票子，占位子”。他说如此篡改履历无法自圆其说，会闹笑话和丢丑，比如好像篡改者是其母60多岁时生的似的，等等。其实既然无耻，只要三“子”到手，他们可以六亲不认，或者把妈妈说成“邻居奶奶”。改履历者其实有三宗罪：对国家不忠；对高堂不孝；给自己折寿。

陈仓《我注册“非主流经济学家”》 向“主流经济学家”开火的大炮太多，所以陈仓先生打算注册“非主流经济学家”，说此举是向“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所学。依我看，郭的“非著名”，不过是向“非常著名”的一个铺垫——他如今是不是已经“非常著名”了？陈仓说了：“主流经济学家说得的事，非主流经济学家也说得。”那他离“主流经济学家”不远了——也没必要特别“注册”。

陈章《都是“中国军队”》 对于历史的看法，因人的阶级和观念不同，难免带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然而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历史永远不可能再现，但是历史研究者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比如对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辨析，既是对历史的追问，也是对现实的交代。陈章先生以杂文笔法涉足这个敏感话题，也需要勇气。

陈长林《芝麻炒糊了，还是芝麻》 那么不计工本、急切周到、费尽心思、细致入微地记录一个妇女妊娠产子，仿佛这个工程比一项尖端科学实验重要百倍，而完成这实验即可跻身于中国工程院或国际工程院院士似的。不读陈长林先生妙文，本人孤陋寡闻，真不知有此等奇事。或问媒体和娱记：人家怀胎生娃娃，干卿底事？即使找卖点，何至于如此下作！近日香港艺员肥姐重病住院卧床

呻吟，也遭此劫。这样的媒体和狗仔，用一个字形容，“贱”，用两个字呢，“缺德”。可受众养活他们，不是让他们去缺德犯贱的。

陈丹青《救救鲁迅》 陈丹青教授转述：鲁迅之孙周令飞曾动问：“鲁迅是谁？”鲁迅之子周海婴则表示，“文化的鲁迅”，其真实形象根本不是一个“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陈丹青眼里，鲁迅形象和遭遇如何？他说：“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救”鲁迅，是说那老头危乎哉了！“救鲁迅”和“还原鲁迅”，是一个概念吗？陈先生又说：“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现在的孩子对于文化，正如童谣所说，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早将自己烧毁”；变化了的“我们”，能“救”鲁迅于既毁吗？

陈鲁民《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陈鲁民先生近来作文，与毛志成教授犯一个毛病，即颇爱“罗列”。很多作者均宗此道，一时成风。一般说我不喜欢这种讨巧笔法，但鲁民先生这回罗列得精彩，意味无穷，吸引了我青眼。将这么多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归拢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而论之，也是一种独特本事，至少不能“谈笑腹笥空”吧。另，巧妙联缀，引出大义，也须一番功夫。

陈四益《闻过则——》 “一些并非圣人的名人，略有虚名，也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会出错的人，然而，这又是力非能及的事。于是，为了这个虚假的形象，就不免东遮西掩，时时闹出一些颇为滑稽的小喜剧来。”陈四益先生揭示的这类现象，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今天这样的“小喜剧”不但绵延上演，还被打着“文化”旗号的导师级人物通过现代传媒“发扬光大”，致使学者无赖化、小丑化，学风败坏，青少年被荼毒，为害不浅，也就成了“大事”。

陈四益《像教的消息》 陈四益先生批评弄“孔子标准像”之举，说它近乎“造神”：“作为一份历史遗产，孔子不朽；若要造神，对于孔子和造神者，大概都未必会是幸事。”人们也许还有疑惑：“幸”与“不幸”之事另说，孔先生生前基本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狗，也没有玉照，怎么才能把他老人家“造”得像一尊“神”，而且“标”其“准”呢？

邓刚《你的敌人在镜子里》 据说美国黄石公园有一漂亮小屋，紧闭的屋门上写着“世上最可怕动物”诸字。游人好奇，推开大门，却只有自己尊容赫然而现，于是色变——原来屋里对面墙上，被社会人类学家镶了一整块镜子。邓刚先生劝咱们每天揽镜自照，可能有人觉得那玩意儿是“哈哈镜”，不能写真自身；邓先生于是另立几块“超哈哈镜”（自“超女”以来，“超物”遍地），让咱们受用——那里映出的，除了绝色美女如西施如章子怡，可都是潇洒帅哥似潘安似金城武了。但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或许还没有解决。

狄马《苦难的妙用》 如今什么都“文化”了，比如“跳蚤文化”等等，据说大都关涉社会发展与民生大事，有发掘研究之必要。狄马先生于本文提出一个概念——“冷血文化”，以前是否有人用过，不得而知，我倒觉着新鲜。他说：“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荆，换来的只是

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他把这“换来的一句”，叫做“空洞抒情”——又一个新词。可用青着“冷血”的笔锋去“美誉道德”，真是糟蹋了“抒情”这个美好字眼儿，何止于“空洞”？

方成《语言的滑稽》 方成先生，漫画大家，也写幽默杂文，双佳。该文说的“滑稽”，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幽默吧。幽默大师林语堂说：“幽默家运用思想和观念，就像高尔夫球或弹子戏的冠军运用他们的球，或牧童冠军运用他们的缰绳一样。”这叫“出神入化”。方老本身即一幽默家，才能写出如此妙文。一般耍笔杆的，哪来这样的“自如”？

方希《关于坐怀不乱的三种假设》 关于柳下惠的“坐怀不乱”，多数人褒为圣洁，也有人贬作虚伪、压抑人性；关于被动“坐怀”女子，则一直很少人论及。方希小姐“设置”了故事的几种情景，叫人们不要望文生义，单单给柳先生打道德高分，基本符合历史逻辑（这是我自造的词）。方希小姐完全可以根据她的想象，攒一个新编历史剧《柳下惠和他怀中女人的担当》。担当什么？一曰美名，一曰责任。

方舟子《秦始皇在娘胎呆了十二个月？》 凡以事实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论证某个既有“说法”之谬的活泼文章，我都喜欢。方舟子先生从吕不韦不可能把宝押在子楚的儿子身上，赵姬不可能怀胎12个月，以及《史记》的写作特点这三方面，令人信服地断定，秦始皇生父并非吕不韦。作者写此文，显然不单要戳穿一个历史谎言，更着眼于批评很多“学人”一贯喜欢将传奇当史实这种极不严肃的学风。就说这个事，那明明是太史公在修史之时写的诗，而诗并非史。

房连水《当美女作为“名片”》 中国人，或者说更多中国男人，对“美女”最为敏感。别的不说，人家乌克兰有个女士季莫申科当了总理，只因有点儿姿色，咱们媒体就张口闭口“美女总理”不绝。事关国外，事关政坛，人家季女士又非以“色”事人者，你管人家“美”不“美”干什么——仿佛人家也把“美女”当名片似的！房连水先生此文，就差刻画中国大小龌龊男人看到华丽女人时直勾着眼睛、流着口水和收不拢下巴的尊容了。

冯远理《“伟人”制造法》 因为不喜欢武侠小说，金庸的书我一本没看。冯远理先生居然从金著里透视到“现实的影子”，促我也抽空去拜读一二。而如果金大侠真的影射了“现实”，咱们最好心照不宣，即使读出来了，也不要特意指出来。

符号《农民工的“情人节”》 符号先生文中引了秦少游“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并问：“不知少游先生本人，是否很乐意同他的夫人一年只见一次面？”问得好。少游少时客游扬州等地，与歌妓往来频繁，大概没工夫管什么夫人不夫人。现代久旷的民工，在“两情”方面，只有偷看黄色录像的份儿，也不会填词，去悲叹什么“伤情处，高楼望断，灯火已黄昏”（秦观《满庭芳》）。

符号《浩浩荡荡“公务”出国游》 这是老题材，公费旅游国人已司空见惯，但是符号先生以亲历亲见发感慨，写出了“公务”出国游的新花样、新伎

俩、新气势，就生动具体了许多，从中更可看出这类“官人”两大特色：一、“与时俱进”；二、富有“创造精神”。

高低《去“铜锣湾”的方向》 诸多欲往“铜锣湾”的人们，临了却去了“烂泥湾”。为什么？高低先生说，是因为“去‘铜锣湾’的方向只有一个，然现实社会的……‘诸多’人经不住诱惑，于是去了‘烂泥湾’。生存难，选择人生方向更难，但是也可以选择。鲁迅塑造的“过客”处于虚无黑暗之中，明知前面是乱葬岗子，却决不向“没一处没有名目”的来处回转去，而是执著地“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因为他老是听见一个无以名之的“声音”召唤自己。那声音是不是“信仰”？如此“过客”太少，苟且偷生者太多，很多人于是“无奈”地把自己“选择”成了“烂泥湾”里的“非人”。

高红十《狗年生肖壶》 中国人熟知这句名言：“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传统现在几乎传到一切中国人身上——不光“文人”，也包括“武人”以及“非文不武之人”，比如本文所列“在马路边卖盗版光盘的妇女”等等。因《理想之歌》而名噪一时的高红十女士，写紫砂陶艺大师葛军及其精美作品，喜气洋洋，妙笔生花，却不得不笔锋一转，蘸着悲愤，重点揭露如今盗贼遍地，盗事频发，除了盗文章，还盗一切别人独创的东西，以及人们不以盗为耻，法律对盗也莫之奈何的非理想现实。

瓜田《贪官与小偷之比较》 君子得位则昌，失位则良；小人得位则横，失位则衰。我读瓜田先生此文，觉得贪官与小偷的表层区别是：贪官居“权位”时要鬼把戏，沦到“罪人位”时演滑稽戏，总之是演戏；小偷则一贯保持本色。二者实质区别是：贪官窃国，小偷窃钩。

郭庆晨《领导的成就感与百姓的幸福感》 鲁迅说过，平民不会在“舍命改革以后”，“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宴”。为什么？“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和面。”郭庆晨先生笔下农垦局和局领导的富，与生产队及农垦职工的穷，形成鲜明对照，可谓两极分化的一个标本。本来，他们都属于“平民”，大家同心改革，可改革带来的“鱼翅宴”，却叫新贵们“安排”给了自己，任己独享，平民被剥夺了“安排”的机会和权利。这又是为什么？只能说，这些领导背叛了改革初衷。他们变成像旧社会那样的“上等人”，连“杂和面”都没有心思给平民“安排”了，更别谈什么本该由大家共享的“鱼翅宴”。因此，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报以极大期待。

郭松民《延伸一下崔永元的“炮火”》 郭松民先生的“炮火”延伸到了这一步：“在今日中国，为了完成同样的历史进程，又有多少少女卖淫？多少矿工惨死井下？多少农民失去土地？多少市民因为被强制拆迁而流离失所？多少改制的国企工人下岗？有任何一部电影反映过他们的痛苦，关注过他们的命运吗？没有！”电影大导们渴望国际大奖“临幸”，自然没工夫管这些“琐事”。实际上这“渴望”近乎妄想。国际大奖，一般总是顾及关心民瘼的艺术家“自然而然从心中流露的东西”，“玩飘”的劳什子，一般没戏。

郭兴文《理性思考烧饼经济学》 一个烧饼，被郭兴文先生来了一番“经济

学”演义，颇见“恶搞”（其实是“善搞”）意味。对付拉了西方摩登经济学大旗，并且放大走样，又作为自己的虎皮来吓唬中国老百姓的所谓“经济学家”，这不失为一种好战法。时髦“经济学家”布下迷魂阵愚弄老百姓，斜刺里跑出个大侠“即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之阵脚大乱而出丑，并且气急败坏，虽然不能动摇“主流”们的地位，至少不失为一快；要不然，被“经济学家”的“改革”高论弄下岗又没有话语权的那些人，憋气都憋死了。你“死”了，人家也会说，“活该”。

郭兴文《张维迎的羊头与狗肉》 跟当今摩登“经济学家”论战，其实很掉份儿——因为那些人很多时候不说人话。瞧瞧他们的妙论：“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就叫人家这样一口“唾沫”湮灭了，还冠以什么“帕累托改进论”。这已经不是“论”，而是编造痞子小说了。他们又要利用这个“论”，说“等到做大蛋糕”再给“受害者”予以“补偿”。这也不是“论”，而是画了个大饼让老百姓充饥。跟这样的“学者”，有什么话说？便是郭兴文不剥下他们的“学者的独立性”画皮，难道老百姓会认为他们是“独立”的？

郭振亚《人与兽》 郭振亚先生说：“人们对那些行为猥琐、心理阴暗、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人，称之为衣冠禽兽，或者称之为禽兽不如。”郭先生用这个一般人认同的观点来批评坏人，有一定道理。而我更赞同“人不如兽”观。实际上说禽兽坏，是冤枉了它们。因为：人有智能，有高级思维，凭理智、规矩、道德生活，本是知好坏善恶的；禽兽则谈不上善恶好坏，它们仅凭本能活着——饿了难免弱肉强食；发春了很多时候还“乱伦”呢。没人给它们定一个道德法规，定了，它们也不知遵守。“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经·相鼠》）你说凭理智活着的人，依靠自己的高智能，做出比凭本能活着的禽兽所为更加不堪之事，不是比禽兽坏了百倍还多吗！

韩小蕙《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富豪？》 韩小蕙，散文才女。她这篇大作以自身亲历，从一个人、一家民企为例阐发观念，生动具象地回答了标题里提的问题：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富豪？这种富豪其实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人。后面小蕙笔锋一转，论及被当今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仇富心态”，不动神色的几句话，即画出“仇富”论者的嘴脸，与别的批“仇富”论的干吼文章大异其趣。这就是散文家笔下的杂文。

何怀宏《刘姚原来不读书？》 何怀宏教授说的是因材施教和成材因素问题。唐甄《潜书》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为向导，“友”即氛围，即使是天才，学而有成的这两个条件，也缺一不可。《太平御览》说：“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芸芸父母别忘了想一想：世上有几个刘翔、郎朗？

何三畏《坦然走过乞丐的本事》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比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都会“怵惕惻隐”。何三畏先生这里说的乞丐，不是还

没有“将入井”吗，路人当然可以“坦然走过”——况且连张爱玲也不喜欢乞丐呢！不过人对于应该由自己处理的事，须“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找了别人做依据才“坦然”，怕不能“坦然”彻底吧。

何三畏《孔庆东先生的“无耻爱心”》 孔庆东副教授（一说“教授”，他从不否认）时有惊人之语。他最崇敬金庸，利用他在电视上的话语权，把不喜欢或批评武侠小说的人骂得狗血喷头。我替他想了一个“脱贫”良方，不妨跟亿万富豪金先生学写武侠小说，那样，他也用不着“无耻地爱国”了。

贺卫方《真相难求》 关于“求真相”，连顶尖法学家贺卫方都大叹“尽人事之外，还要听天命”，令人心不是滋味。贺卫方教授旁征案例，又引经典，温婉地充分地说明了“一部司法制度的历史记录是人类为了揭示争议事实真相的宝贵努力，同时也展现着人类自身的局限和无奈”这个事实。事实如此，咋办？——“冥冥之中，善恶终有报应”。大学者的玄乎高论，也许会疏解人们不时泛起的某种激愤之情。

洪巧俊《鳄鱼的“牙签”》 洪巧俊先生文中所谓“鳄鱼”，实际为奴才化身。奴才因替主子卖命而偷生，也因主子的庇荫而作威作福。有人羡慕“鳄鱼”，可他们没有做奴才的本事，不知个中蹊跷，又贸然效法，冀有所获，结果适得其反。即是说，那些渴望当“鳄鱼”者，连“一种做得很漂亮的走狗”（鲁迅语）也不能。人一旦明白个人最高价值即在于对社会和他人有用，只为“义”献身，不为“利”所诱，就会活得轻松坦荡，像个人样，而不会陷入“鳄鱼口中死去的鸟”那样的悲惨境地。

洪巧俊《我们的思想能走多远？》 布鲁诺否定了教会“地球中心说”。罗马教廷让布放弃信念；他不肯，被宗教裁判所夹断舌头，并活活烧死。这世上最不可思议之事，便是权势者要管住无权者的思想，管不了思想，就消灭肉体。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可以“教化”，使之达于高尚聪慧而便于认识真理；然而思想是不可禁锢的，因为它类似于空气，了无形迹，叫“管理者”无法抓挠。比如布鲁诺，他死了，可他的思想光大到全球而长存，弄得教会今天还要给他“平反”。有一个庸俗笑话：一个男的对老婆说，他“做梦娶媳妇”了——娶的是另外的美人。老婆正告：不许做这样的梦。男的诺诺，可梦照做。老婆的“不许”，等于零；而如果老婆从此对丈夫恩爱有加，也许他就不再对别的女人“梦寐以求”了。思想能走多远？可近，可远。

黄波《看袁克文写他爹》 俗话说“孝不生于慈父之家”。袁世凯大发“父威”，关了儿子袁克文禁闭，谈不上“慈”，所以克文挺“孝”，一个劲儿讴歌他的坏爸爸。可“父有过失，子当谏争，岂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克文终是落了个“不孝”！我选黄波先生这一篇，重在一句话：“‘我的父亲’之类的文章，真是不读也罢。”不过那该指“名儿女”写爸爸（包括原本无名而儿女文章出来肯定有名的爸爸）；平头百姓写爸爸，动机纯正，不会“谲夸”——夸也没用——只要那文章有幸面世，则不妨一读。

黄一龙《愚公移山：移到哪里？》 愚公把山移到哪里？这山指的是什么？

愚公何许人也？读过《列子·汤问》的人有一个答案，读过毛著《愚公移山》的人也有一个答案。黄一龙先生的答案是什么？他答得很暧昧：一会儿说那“两座大山就在全中国循环大游行”，一会儿又说“至少其中一座大山的‘残余’还留在大陆”。黄先生究竟想说什么？我引黄先生几百年前老本家黄宗羲一段话吧，他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贤指为血路也。”

黄一龙《“半瓶酒”读报法》与“如何看瓶子里的酒”类似的说法，至少还有一种：一朵玫瑰，有人只见其花之美，有人只想其刺之扎。咱们都知道这种思想方法违背“两点论”，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却往往只盯着“一点”。至于读报，我觉得芸芸众生都会不经意地被舆论牵着走，哪容静下心来思考“瓶子”的或“实”或“空”？那不仅要有理性，还要有非凡的想象力，太难，也太累。

黄子平《少时读鲁》 鲁迅很多文章我看不懂，从少年时代至今，没有好好读过。我只念过他几篇文章，但正是这几篇，却使我像黄子平教授所说，一直“活在鲁迅笔下的暗夜世界之中”。别人夸他骂他两由之，都改变不了我对鲁迅文章（兼及这个小老头本人）的态度。这没有别的理由，仅仅因为爱听他那些话（“那些话”别人说不出）。今有告诫少年不读鲁迅者，是瞎操心——他们追“超女”、网聊、打游戏机、约会……还忙不迭呢，用你劝？爱读鲁迅的，你也“劝”不住。

蹇庐氏《汉川领导的脑筋哪点儿“糊涂”？》 汉川市政府发文，让本地人喝以“糊涂”名之的本地酒，正好可做文章，舆论于是顺理成章将现成的“糊涂”二字，贴在政府决策者身上，妙。蹇庐氏反公众正义舆论而行之，为胡闹的当地领导“辩护”，说他们其实挺聪明，如果有一点“糊涂”的话，仅仅是事前事后脑筋不会“转弯”而已，也妙。此“二妙”哪个更“妙”？回答这个问题，用不着脑筋转多少弯儿。

蒋萌《洋玫瑰，爱你不容易》 爱情虽说是天赋之物，但并非人人都有自觉的爱情追求。什么是爱情？封建社会是妻妾成群；无产者造反时代是“革命加恋爱”；当今时代呢——玫瑰九千九加长吻12小时加大洋百万？蒋萌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意思许是：人类还没有进化到懂得真爱的阶段。小蒋是一位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杂文新秀，愿他不断上进，并获得真爱。

蒋元明《股评家萎靡了，理论家辉煌着》 股评家和理论家，都是吃“摇唇鼓舌”饭的，很多时候是“骗子”的代名词。股民屡被“股评家”害惨，才学聪明。庶民屡被“理论家”忽悠，一时清醒，一时糊涂。“股评家”由吃里爬外、吃香、吃白食到吃瘪、吃不开、吃官司，乃是必然。“理论家”由吃干饭到吃不了兜着走，“辉煌”之日无多。蒋元明先生的意思许是：老百姓也该吃一堑长一智。

蒋元明《一万张打工子弟的课桌往哪放？》 教育衙门命令：没有启动资金，没有现代化运动场所、卫生环境、教育设施……你这打工子弟学校不合格，关门，否则误人子弟，违法。打工子弟哀号：我要上学！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探问：一万张打工子弟的课桌往哪儿放？这“一万”，仅仅是北京一个区的数。如

果有这样一件事——穷人吃糠咽菜没有大米白面，衙门说不符合营养学，把他锅砸了——这叫“依法办事”吗？如果这砸锅不叫“误人肚皮”，那么“关校”也不是“误人子弟”。“误人子弟”的罪名，只能让打工子弟学校去背。谁背“罪名”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千万哀号的娃娃没学上怎么办？这就是中国的怪事儿。

蒋子龙《2005年的语录》 2006年回味2005年之事，包括“语录”，正当其时。蒋子龙先生此文引征丰富而取舍精到，捧读令人忍俊不禁，笑后不无悲伤。子龙先生所录王静的段子，大约概括了他所谓官场、市场、情场三类语录，我挺认同：“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治安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治安。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但这里既然以“人”说事，则将几类重点凤头人物比如“官人”遗漏了，我想大约是不便说，说了，编辑也会删除。

蒋子龙《小话“大话文化”》 制造出各类“大话”的，多半是各类伪专家。鲁迅曾嘲笑“专门家的话多悖”，就是批评自称“专家”的人“论他们所专门以外的事”这现象的。但是可怜见的小百姓，怎知谁“专”谁“伪”？左右为难、不知所以的小百姓被忽悠，于是成为常态。经蒋子龙先生一番梳理，我看出了“大话文化”两大特点：一、摩登、热闹；二、邪乎、“高深”。凡具备这两大特色的话语，咱们最好警惕一点儿。很多时候，识破“大话”只需常识。

焦加《炒作自己，造福社会》 “如果社会需要的不是巨人，而是侏儒，那么也必将产生侏儒；如果社会不需要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而只需要快餐，那么必然是大量的文化垃圾被制造出来。”这个话虽然是依据恩格斯名言而衍生的，却也是焦加先生对当今社会潮流的一个精湛概括。当然，作者从小人物郭敬民的自我炒作“觉悟”，看出了一种普遍社会心态，不是他眼力如何了得，而是这现实怎么得了！不过，郭先生大著《叫我如何不宰你》说的，可都是令人惊心动魄之事，光看书名，就疼得慌。说他无奈之下“自我炒作”，不如说他争取当了一回“叛徒”。而他暴露了旅游业丑恶的“潜规则”，又怎样？答案是：既无法“造福社会”，也奈何不了旅游业。这方可归结为“文化”。

金陵客《戏答余秋雨“多大事”》 陈确“大病只一自是”；韩非子“大必起于小”；陆贾“大名垂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魏征“大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吕坤“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钱大昕“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尉繚子“不详在于恶闻已过”……说的都是“多大事”。多大事，多小事，自有旁人说短长，金陵客先生的意思也许是：自己说大说小，不算数。

金陵客《不懂不说》 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竿。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

言而不言是愚之符。大智若愚，自爱者慎，比“自多其能，其能不足”而貽笑大方强。

金生叹《胡适·赛金花》 金生叹先生把胡适故居与赛金花“故居”面貌分别做一番描述之后，说“如此假古董（赛金花“故居”），竟然也享受‘胡适故居’待遇”云云，此言不妥——仅从赛居的“天下第一厕”和胡居的“卖鸡蛋农妇”看，二者何曾“享受”了省文保部门的同等待遇？类似之事，人们已见怪不怪，并非像作者大惊小怪说的什么“匪夷所思”——这年头，还有什么令老百姓“匪夷所思”之事？

金一南《不知道自己英雄的人》 金一南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发生在60多年前一个小山村1000多个孩子身上的故事。故事似乎平淡无奇得连主人公自己都懒得提起，却又那么震撼人心——说那些孩子是1000多个“刘胡兰”，也不为过。它发生在淳朴的乡下孩子身上，是那么自然而然。金教授把故事精神归于“做人的底线”和“集体自尊”，实际是融化在血液里的民族大义。今天富起来的人们，还守得住这样的“底线”吗？

孔曦《点我发我夸我骂我》 鲁迅说：“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但是人很多时候又不属于自己。西方神学家加尔文说：“我们属于上帝。”从孔曦小姐文章看，现在的人都希望属于“别人的眼球”——这样的人是由“各色人用各色符号相加”（鲁迅语）而成的。其中成功者聚焦于亿万眼球，于是超尘，美名曰“超女”、“超男”等等。在几个聪明人策动、一帮准聪明人受益的这个“超级”大欢乐中，芸芸众生被“制驭”而养成了很多下等脾气，也浑然不知“自己是谁”了。

雷颐《听取“哇”声一片》 一位历史学家，从语言交融的历史演变，说到对当下“流行语”的宽容，娓娓道来，颇具亲切感。这本是刊登在高雅“学报”上的论文，但面目不像另一些硬邦邦的流行讲章那么可憎，稍加删节，竟成一则知识含量颇高而生动活泼的杂文。雷颐教授说到的“奔驰”，我记得有人还译为“笨死”呢。又，超短裙哪有“迷你裙”性感？其实语言也应该现代化——“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就被译林高手译成“妈的奶最香”嘛！

黎明《就拿这个名字开涮吧》 “劳动和社会保障”，名字动听（尤其有“社会”两字），设立这机构的初衷，也是为了广大百姓，只是多半出于无奈，它的受益设定一不科学，二不全面，造成名不副实，因“名”害义，于是招致了黎明先生和网友的“开涮”。虽然“开涮”这个词用得狠了点，但我想黎明及网友也是出于好心。大概他们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话：“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黎明《中国人为什么“大度”不起来？》 这篇文章发掘了造成“中国人内心深处恐惧”的根由，诊断了中国人“穷毛病”的来历，视角独特，多相对照，辨析精辟，比正人君子们扯着嗓子痛批“中国人的吝啬和贪婪”劣性，具有震撼人心的说服力。

李辉《李咏不是“李白”》 李辉先生说，“和‘文化瑰宝’李白相比，